



水的精神

· 茶烟一缕 ·

王铭铭*

1963年10月,法国《医学与卫生》杂志发表了当年还属于少壮派的社会思想家福柯所写的一篇随笔。那篇文章题为“水与疯狂”。这位试图从精神病理学的反思寻求社会批判之道的哲人,特别关注文明与癫狂之别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,那篇随笔

要说的事,必定还是与“疯狂”有关。然而,水这种东西,究竟与疯狂会有什么关系?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人们,不一定能够顾名思义。《论语·雍也》有言:“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知者动,仁者静。知者乐,仁者寿。”说出这句话的孔子,从水与山的隐喻式对比中,表达了他对于人的分类的看法。在孔子的话语中,智慧人(知者)像是水这种动态而欢快的流动物,而道德人(仁者)像是山这种静态而恒久的固定物。荀子在《王制》篇中借助水与船的“二元对立关系结构”,来对人的类型及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关系加以再度表述。荀子说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话:“君者舟也,庶人者水也。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。”此言因于唐初被直言不讳的魏征在其《谏太宗十思书》中引用,而被后人理解为古代“民主思想”的源泉之一。将老百姓形容成水,将君主形容成船,还是一种分类的概念,在水船的关系结构中,作为知者象征的水,还是被作为仁者(特别在被附会为君主)所“运用”。

也许古代中国延续着某种“以静制动”、“以仁制知”、“以君制民”的制度?也许历史上诸如此类的“二元对立结构”比我们想像的要灵活得多?无论答案为何,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,我们先人的政治世界观是确立在某种“以物论人”的分类学基础之上的,他们总是以“二元对立结构”来说事儿。而作为他们的后代,我们也不易理解欧洲式“绝对主义”论说,特别福柯以“水与疯狂”为题阐释的历史。

福柯在开篇时即说道:

*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。





在西方人的想像中,理智长期以来就属于坚实的大地,无论是岛屿还是大陆,辽阔宽广的大地执拗地推拦着水,只给它留下岸边的沙地;而非理性则自古以来就属于水,更确切地说,属于汪洋大海,浩瀚无边,动荡不安,变化无穷,却只留下淡淡的痕迹与浪花,无论是狂涛骇浪还是风平浪静,大海永远是无路之途。

如果福柯所说的符合事实,那么,我们便可以对上面这句短短的“开场白”做以下几点或许是属于比较文化学范畴的延伸:

1. 欧洲人与中国人(至少是它们的思想家)一样,在流动的水与固定的地的“二元对立结构”之间寻求“说事儿”的可能。

2. 但是,中国人将水与智慧相联系,欧洲人则将水与疯狂相联系;动态对于中国人来说是“知”的表现,对于欧洲人来说,则属于“疯狂人”的行为。

3. 固定的大地与它的山脉,对于中国人来说,是“仁性”的,但对于欧洲人来说,则是“知性”的。

4. 对于中国人来说,“知”与“仁”、“民”与“君”之间的对比是重要的;对于欧洲人来说,“理性”与“疯狂”的对比是重要的。

5. 对于中国人来说,人类自身可以截然区分为两种性质不同、政治角色也不同的“类别”;对于欧洲人来说,人类自身的性质是单一的,无非是在个人的“内心世界”存在着“理性”与“疯狂”的矛盾斗争。

对于“理性”与“疯狂”之间在人的“内心世界”之惨烈斗争,福柯用一种精神病学史的眼光给予了注视。

也许正是因为古老的想像中疯狂具有流动的本性,我们[欧洲]的文化才出现了若干重要主题,如:醉酒是一种短暂的,不固定的疯狂;气郁是一种轻度疯狂,是在有内热和精神过于兴奋时人体内逐渐聚集而形成的一种模糊的、弥散性的气;忧郁是静静的、黑色的水,是泪水汇聚而成的郁愤之湖;还有性兴奋带来的精神错乱及其不可控制的发泄。

于我们,醉酒、郁闷总与李白、杜甫的创造性有关系,而这乃是因为:在我们的眼里,水与智慧的联系至为密切。而在欧洲历史上,水与疯狂相联,与非理性相联,才更通常地被人们联想到创造。欧洲文化似





乎不存在仁者治水的说法，君主之王权也从不产生于中国式的治水传奇，存在的反而是一种“自我治理式”的“以水治水”精神病学。

福柯说，直到19世纪中叶，欧洲人对于疯狂才从围绕着水来想像转化为对于烟的想像。在此之前，水一直是欧洲人想像疯狂的核心词汇。对于欧洲人来说，水除了象征疯狂以外，自古也是一治疗、对付疯狂的“药方”。用教堂的“圣水”来清洗教众个体内心隐藏的癫狂，是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。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，水在治疗疯狂方面，又产生了精神病学的“变奏”。17世纪，欧洲形成了在我看来与教堂训诫方式不无继承关系的精神病水疗法。那时，人们相信暴雨是来自天上的纯洁之水，能治疗癫狂之徒的污浊之水。于是，他们发明了一种治疗方法：将患者绑在车上，由不疯的人赶着车子在暴风雨中狂奔。后来，人们又相信疯狂可以分成两类，一类是躁狂，一类是忧郁之狂。治疗这两种疯狂，人们以为要区别对待：他们用冷水浴来治疗躁狂，用温水浴来治疗忧郁之狂。到了19世纪，浸泡和淋浴成为治疗疯狂的手法，精神病医生为了治疗精神病患者，有时将他们放在平台上，突然自上而下冲水，或突然将平台降入水中，由此“水获得了四个功能。它能使人感到痛苦（由此使患者重新回到他试图回避的现实世界中来）；它令人受挫，使患者清醒地面对自我；它打断患者的话，使其沉默，因为那无休无止的饶舌不仅仅是疯狂的信号，其本身就是疯狂；它对人进行惩罚，医生根据监护人员的报告亲自控制这种惩罚，当患者悔过时便停止”。

中国历史上，人们对于疯狂并非不存戒备之心。但我们的先人在描述疯狂时，似乎缺乏欧洲式的焦虑，而将它与燥（躁）联系起来，以为那是因为阴阳失调引起的。例如，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就说：“诸躁狂越，皆属于火。”其《宣明五气论》则说：“邪入于阳则狂。”后来的医术则做了更多区分，将由于阴气太重引起的癡，与由于阳气太旺引起的狂区分开来，以为狂属于“肝火”的一种。然而，对于这种“肝气太旺”引起的病症，中国历史上的医家大多还是用泻肝清火的草药，并没有像近代欧洲精神病治疗家那样，“以水攻水”，“以狂治狂”。

比较而言，古代中国人给水赋予“双重性质”时，似乎也并不关心水的性质，而更关心它的不同量所可能产生的意义。因而，古人对因水太





多或太少引起的“淫”与“旱”做了比较集中的区别,对因水而起的疯狂、由水造就的理智不重视。

涉及到水的象征意义,种种“梦书”的解释,也是值得关注的。敦煌本《梦书》多次提到梦见水的情况,并做了“迷信主义”诠释,例如:

梦见入水中戏者,大吉。

梦见止水者,大祸,凶。

梦见水竭,有忧。

梦见饮水者,得财帛。

梦见水流,吉,所讼得理。

梦见大水者,大富。

梦见天地大[水]者,事起。

梦见江湖海水,大昌。

梦见大水波浪起伏者,不安。

在《梦书》中出现的水,属于一种资源,水出现的量的多寡,及出现的具体方式,决定了人的运气的好坏。这一切从一个侧面表明,水在我们先人的这种观念中,与“自我”的“双重性质”关系不大。无论是作为经典文化中的“知者”的象征,还是作为庶民化的《梦书》的财富和吉凶的象征,水的量——而非质——都是我们的先人最关注的。

说了这么多,无非是要表明,围绕着水这种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,中西文化各自延伸出自己想像世界的方法。从教堂的忏悔,到福柯笔下近代精神病学对于个人的“惩戒”,从圣水对于自我心灵的陶冶,到医生的狂水对于精神病患者的“冷却”——在欧洲这个大舞台上,水演绎了“超我”与“本我”、“理智”与“癫狂”、“文明”与“野性”、“社会”与“自我”之间自我斗争的戏剧。而在中国历史中,《说文》所说的象征“众水并流”的水,则一样经受了政治神话的锤炼,中欧之间所不同的是,它在这一锤炼中获得的意义是有自己特色的。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,水这种或许是属于天赋子的资源的东西,因其量的变异,而衍生出种种不同意义。理想中的“曲水流觞”,构成了我们的国家观念的“一半”。我们将国家形容为“江山”,与上古时期先人对于水的知性、对于山的仁性的诠释,相互辉映。由此,我们的政治神话,也都与水紧密地联系起来:天上下的雨多了,先人便将人类的祖先女





娲传诵为“补天”的文化英雄；大江的水患破坏力大了，先人便将自己的首领传诵为治水的大禹；当农业经历太多干旱，而破坏了人们的休养生息之时，政治家便成为祷告上天、为民“求雨”的人物；江河湖海的流水经过不断的开发，也成为联络“天下”的网络，在这些网络的接点上，有过多少的“水神”被“推戴”出来维护世界的秩序。到了海路交通的重要性超过了南北贯通的运河之时，来自小小村庄的少女之魂，也可能被皇上以古老的封禅仪式“敕封”为“天后”，她的神格被认为足以“以德配天”。或许也正是在水的政治文化氛围下，民间流行的种种有关“水梦”与运气的解释，淡化了水与“淫雨”、“淫乱”、“淫词”及“水性杨花”可能构成的深层关系，极大地限制了弗洛伊德式“释梦心理学”的生发空间，使中国文化的“仁学”恒久地压制着“自我之学”。流水与狂涛，“仁学”与精神分析学，在各自的微观世界里演绎着宏观的政治世界观的特征。在希腊神话中有故事说，人类一度做了许多坏事，世界之主宙斯非常恼火，他决定除灭人类，他策划了以暴雨降落到地上、用洪水淹没人类的阴谋。而他的兄弟，海神波塞东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他把河川都招集起来说：“泛滥你们的洪流！吞没房舍和冲没堤坝吧！”他用三尖神叉撞击大地，摇动地层，为洪流开路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，也有水神共工的神话，但他骚扰人类的世界，并非是因为人类有“恶”，而是因为他与火神祝融之间闹“人事矛盾”。在他的斗争中，水也并非作为毁灭人类的武器出台的，而是他与火神战斗需要的兵马。最后将人类拯救出水深火热之中的女娲，用以“补天”的五色石，与水也没有矛盾——它们就像水这个汉字，是从江河中提取的。而从这个对比中，我们也许又获得了一种理解“风水”的可能。晋代郭璞说过：“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，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”这也就是为什么《说文》在解释“水”这个字时，提到“中有微阳之气”的原因，而西文中的“水”却没有这个含义。

最后，这里还应提到老子的“水论”：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；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意思是说，最高境界的善像水那样，有益于万物的生长，却不与万物争夺资源，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，因而最接近于老子理想中的“道”。这段话可以说浓缩了与欧式的水的“非理性说”相异的所有思想。

